

教授、著名移民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学会前任会长波特斯博士曾作以下评价：

“过去二十多年来，移民社会学和移民经济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移民社会学中形成了新概念，新假设和新理论。……然而，美国对亚裔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仍大多局限于描述性地罗列某个族裔群体或社区之历史和变迁，而较少注重从社会学的视角展开实证研究和理论提炼。正是在此方面，周敏的学术研究填补了空白。自涉足社会学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她潜心研究华裔移民和其他亚裔移民在美国的各种经历，以大量的事实和严谨的方法来充实和修正现有的理论框架。她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来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并对现有的资料进行系统的重整和分析，从而得出新的理论成果。她独具慧眼地运用了移民社会学及族裔研究学等学术领域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来提出科学的假设，并用可靠的实证数据来推理和论证，进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因此，周敏不仅丰富了世人对美国亚裔历史和经历的了解，而且为研究移民如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¹

我认为自己对唐人街的研究很有意义，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我的一些同事还把我戏称为“唐人街大姐大”（the Chinatown lady），但我从来都未曾把这项研究当作我的事业的“里程碑”。在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侧重点逐渐转向族裔方面，尤其是亚美社区的研究。有些朋友善意地警告我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成员，以少数民族和本族裔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可能会有“局内人”而不够客观之嫌，容易使自己边缘化，妨碍我成为真正有分量的社会学家，对我的学术前途不利。不过我自己从来都不是好高骛远之人，我的追求是认认真真地致力于每一个新项目，切切实实地制定每一个可行的目标，踏踏实实地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论 文】

分层同化论：

新移民第二代研究的理论突破²

周敏³

“分层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的概念是我和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在1993年共同发表的一篇题为《新移民第二代：1965年后移民子女的多元同化过程与结果》的论文中首先提出来的⁴。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寻求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用来解释美国1965年后的国际移民子女，亦即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以及探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和族裔差异的原因，以弥补经典同化论（classical assimilation theories）的不足。这一理论概念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携手合作，构建理论模型并尝试用新的统计方法来量化和测量这些理论模型，使其经得起实证数据的进一步推敲和论证。有些学者则提出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以完善这一新的理论。还有一些学者把这一理论设为稻草人，偷梁换柱，

¹ 引自波特斯为周敏的《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一书所写的序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² 曾刊于周敏《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第3章。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³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⁴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30 (1993): 74-96.

强词夺理地攻击并试图推翻这个理论。尽管这个概念有被滥用、误解或歪曲之虞，分层同化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被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广泛采用，成为在移民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领域中研究移民社会适应、种族和族裔的族群差异的一个主要理论之一，对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和公共卫生等其他研究领域的也有非常显著的应用意义，其影响力还超出美国国界，成为研究其他移民接收国的移民同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本文旨在阐述分层同化论的立论前提和主要观点，通过讨论亚裔移民子女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机会以及分析越裔难民第二代在美国成长的案例来阐明这个理论。

一、经典同化论的理论回顾

分层同化论建立在对经典同化论的借鉴和批判之上。在有关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的文献中，经典同化论是社会学主流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在学术界享有主导地位，左右学术思潮和实证研究的时间长达大半个世纪之久。经典同化论的立论基于三个主要假设：（1）新移民融入接收国的主流社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同化过程，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既有同化的意愿，也享有同化的平等机会，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融入主流社会；（2）新移民的原有的文化和行为模式是落后的，同化的过程意味着移民必须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和行为模式，才可能学会新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达到同化目的；（3）同化过程一经开始，将不可逆转，直到完全被同化为止。

经典同化论的前提是，接收国社会只有一个核心或主流文化，那就是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多数民族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在美国，这个多数民族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欧裔白人。同化过程的最初阶段会产生一个文化“边缘人”（*marginal man*）的现象，即新移民一方面受主流文化牵引过来，另一方面又被他们自己原有的文化拖拽回去。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认为，这个两极拉扯的过程，意味着一个良性的族裔关系循环，从相互接触开始，因而竞争，然后磨合，直至整合。受本能的因素（自然的竞争）和社会力量（沟通与合作）所影响，不同族裔身份的移民通过与多数民族群体成员的交往和与主流社会制度的不断接触，逐渐放弃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接受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通过几代人的刻苦耐劳、努力工作，最终完全融入主流社会¹。

帕克强调，移民同化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同化的程度可以用社会和文化异质性来测量，即移民群体与主导社会的核心群体的差异的不断降低。但他却忽视了一些重要社会结构因素如种族分层制度的影响。其他经典同化理论的学者在帕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种族和族裔社区及其子系统等各种制度性的因素，对同化的速度起重大作用。根据华纳（*William Lloyd Warner*）和斯若勒（*Leo Srole*）的观点，少数民族群体的同化困难重重，因为少数民族所处的不利地位与某些族裔特性直接相关。他们认为，随着语言能力提高和文化的适应，少数民族群体与核心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上向流动机会的差异会经过几代人而消失，但是某些较大的、有色人种少数民族群体——尤其是非裔黑人——的上向社会流动机会，很有可能仍然由于社会的种族等级制度的制约而难以获得并实现。因此，这些学者认为，移民群体的母语、肤色和宗教是社会中的核心族群对少数民族的接受程度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一起互动，决定了各个族群完全同化的结果和速度²。华纳和斯若勒用族群内部的族裔特性与外部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来解释同化过程的复杂性，对帕氏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和完善。

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用更为复杂的7个层面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同化的过程。这7

¹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1928): 881-93.

² William Lloyd Warner and Leo Srole.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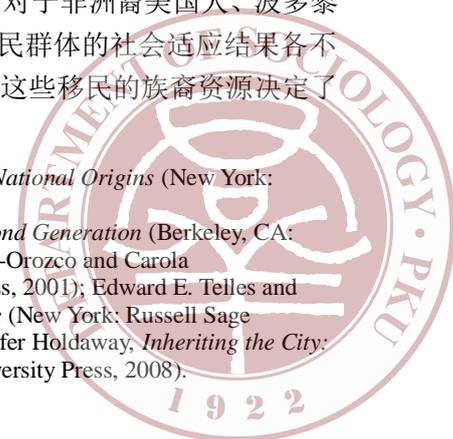
个层面分别为：文化融入、结构性整合、婚姻、身份认同、态度认同，行为认同和公民性同化。戈登认为，移民的同化过程从文化融入开始，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移民要融入主流社会，首先要从语言、宗教和价值观的认同入手。然而，文化的完全融入，如英文流利，皈依基督教和认同基督精神等未必会自动导致其它层面的同化。由于居住模式的种族隔离和缺乏社会互动，不同民族群之间的差别依然相当明显。少数民族的完全同化从根本上将取决于核心群体对他们的接受程度。相反，结构性的整合（如融入主流社会的各种制度机构，迁移进核心群体成员居住的中产阶级社区，或与核心群体成员通婚等）是最根本的同化层面，犹如石拱门顶上最关键的一块拱心石，只有结构性的整合，才能最终促成其它层面的同化。至于不同族裔群体的具体同化过程如何，以及产生变化的原因，虽然戈登语焉不详，不过他预测，最终结果必定是不同民族的移民群体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失去他们自己鲜明的族裔特征，与核心群体成员不断交往甚至通婚，并作为核心群体的一员而进入主流社会的制度之中，而他们本来的族裔身份不复存在¹。

按照经典同化论推论，根深蒂固的族裔特征，如母国的文化，母语和族裔聚居区，以及抽象的族裔特性，都构成阻碍同化的不利因素。但这些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随着代际的延伸而逐步减少。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后代主要通过英文来交流，在生活技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越来越接近美国的核心群体。虽然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未必肯定能够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并置身于其中。无论如何，新移民要先摒弃自己原有的文化，才有可能从边缘的地位开始向上流动。二十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之间，曾经备受种族歧视的东、南欧裔移民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同化过程，成功地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与当时的核心族群（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西欧白人移民群体）融为一体，取得了“非拉丁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或“欧裔白人”的族裔身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结构性整合的层面上，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华裔和日裔群体成员尽管饱受法律和社会排斥，尽管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接受程度还相当有限，但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的硬指标，如教育程度、职业成就和收入水平等的考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非拉丁裔白人群体，结构性的整合方面毕竟已经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然而，另一些本土少数民族群体却还没有按同化论所预测的那样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实证研究揭示出一些与经典同化论相悖的反常现象。第一个反常现象是挥之不去的代际种族劣势。根据经典论，同化的程度与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成正比，本土出生的后辈比国外出生的移民的同化程度要高，即移民子女（第二代）的同化程度比他们父辈的要高，移民的孙辈（第三代）也比第二代要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种族因素严重地影响同化。比如，控制了来源国的因素和家庭背景因素，少数民族群体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与社会适应程度越低，这些测量社会适应程度高低的统计指标包括移民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他们对前途的期望，以及他们的在校表现。对于来自一些国家的移民来说，第一代的贫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减缓，而是延续到第二代。此外，族裔群体之间在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的差距也会延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相比之下，对于非拉丁裔的白人美国人来说，教育水平与职业成就基本成正比，而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波多黎各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²。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结果各不相同，也与移民从祖籍国带过来的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本和有关，而这些移民的族裔资源决定了

¹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²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Marcelo Suárez-Orozco and Carola Suárez-Orozco, *Children of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dward E. Telles and Vilma Ortiz, *Generations of Exclusion: Mexican Americans, Assimilation, and Ra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Philip Kasinitz, John H. Mollenkopf, Mary C. Waters, and Jennifer Holdaway, *Inheriting the City: The Children Immigrants Coming of Ag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移民初始定居的地方，譬如，是在富裕的中产阶级郊区定居还是在城市的贫困区落脚。当代移民的特征之一是出现了中产阶级群体，然而，仍有相当多的移民孩子生活在城里的贫穷社区，讲一口不标准的英语，在那些贫民窟里，移民和他们的孩子经常面对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而鲜有机会接触到中产阶级。他们每天接触到的大多是土生的或外来的少数民族成员，而鲜有机会接触到主导社会的非拉丁裔白人族群成员，这些都是阻碍同化的因素。

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指出的“第二代的衰落”现象¹。甘斯描述了三种第二代可能遭遇的境况：教育驱动（education-driven）的社会流动，遗传性（succession-driven）的社会流动，通过族裔途径来改善社会地位（niche-improvement），这三种境遇与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族裔群体的社区资源有关。他的分析表明，移民家庭的资源丰富与匮乏直接影响子女的成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移民孩子比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更难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因而在职场上也较难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居住和教育条件。住在贫民区的小孩往往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融入和同化模式，一方面，他们向往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部分地接收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如种族平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按个人的意愿行事。既不愿意接受他们父母的职业观，不愿意像他们父母一样逆来顺受，吃苦耐劳，接受较差的工作和薪金待遇，也不愿意抱怨主流社会对他们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漠视，还受到学校、同学和媒体的强有力的影响，他们创出独特的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对着干。此外，他们在服饰，约会和性行为的个人选择等方面为所欲为。这些在城市贫民区长大的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和观念是典型的美国本土亚文化，是在其父母的祖籍国基本上不可能接触到的。由于受到青少年亚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这些移民孩子对生活的物质期望要比他们的父辈高的多，而父辈又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去满足他们的意愿。因此，有些孩子便会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实现他们自己较高的期望，以至与主流社会形成冲突，陷入高危行为，无心向学，参加帮派，以至于参与犯罪活动。还有些小孩会放弃，辍学，过早未婚生育，靠政府福利混日子。虽然大部分小孩想通过教育走出贫困，但也困难重重。不过，在贫民区的公立学校里，移民子女当中成绩顶尖的佼佼者也不乏其人，在获得各种荣誉和奖励的名单中移民的孩子占有很高的比例²。甘斯认为，这些不同的模式是移民子女在试图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难免遇到的坎坷和困难，这些坎坷和困难不仅是主流社会所造成，也与移民族裔社区的一些内在因素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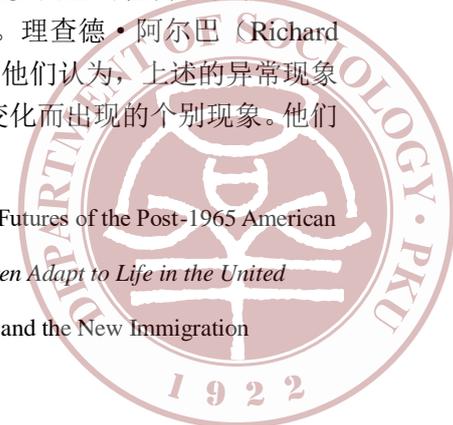
另外的一个反常现象是当代移民同化过程中的各种奇特的结果。一方面，在美国发展最迅速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大量外国出生的工程师和其他高技能专业人才担任了企业和公司的关键的技术职务，有些人甚至成为股东和业主，成为经济实力较强的中产阶级一部分。但他们中间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完成文化层面的同化，如在语言和行为模式等方面还带着浓厚的外国人色彩。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少数族裔开办的商业银行、豪华的高级餐厅和大型连锁超市与传统的信用社，咖啡厅和茶餐厅，以及夫妻店混杂在一起。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为移民提供了各种社会上向流动的路径。在富有的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里，富裕的移民带着雄厚的资本到那里置业安家，直接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会，打破了传统的台阶式逐步向上的社会流动顺序。

上述的这些异常现象说明了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理查德·阿尔巴（Richard Alba）和倪志伟（Victor Nee）是最热衷于同化论的学术代表人物³。他们认为，上述的异常现象不过是因为经典同化论无法预测到当代社会的结构和国际移民趋势变化而出现的个别现象。他们

¹ Herbert Gans, "Second Generation Decline: 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1965 American Immigran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5 (1992): 173-191.

²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Growing Up American: How Vietnamese Children Adapt to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98).

³ Richard 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the New Immi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指出，持续性的大规模国际移民限制了接收国社会吸收和整合移民的“喘息空间”，使族裔聚居区由于大量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而得以补充和延续。此外，“沙漏时钟型”劳动力市场结构日趋明显。其一端是大量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高薪工作职位，另一端则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低薪工作职位。这种经济结构增长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流动阶梯的几个关键台阶的消失。对于新移民，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低，无一技之长的移民，尤为不利。他们要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少了几个关键的台阶势必造成困难。虽然这些结构的变化为同化设置了新的路障，但由于其他体制性的改革，如公民权利以及保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立法，移民政策的改革，以及多元文化论、民权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兴起，重塑了接收国开放的社会环境。尽管仍然存在种族歧视和不利的经济条件，当代新移民和他们的代辈将会比从前的移民要更为容易融入美国社会。因此，他们坚信，既然同化论能够圆满地解释 20 世纪之交时欧裔移民的同化过程，应该也适用于解释当代新移民的同化过程。

阿尔巴和倪志伟重新定义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概念。他们认为美国主流社会“是由法律的建制与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核心制度结构和组织，淡化、甚至削弱原属族裔身份特征的影响”¹。因此，主流社会不仅包括居住在富裕城区和郊区的白人中产阶级，也包括住在城里贫民区的低下劳工阶层，还包括从前遭到排斥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他们认为，所有移民及其后代最终将会这个主流社会所接纳、被同化，但未必像经典同化论所预测的循着单一的方向，朝着单一的目标。他们的新同化论（neo-classical assimilation theory）是个宏观理论，用于解释新移民、尤其是来自欧洲以外的有色人种移民群体和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移民群体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和结果。然而，尽管他们定义的主流社会包括不同的阶层，但是他们衡量的成功，仍然是指融入和同化于中产阶级，而不是融入于劳工阶级或者下层社会。

二、分层同化论的诠释

与阿尔巴和倪志伟提出的新同化论相比，分层同化论是一个受默顿（Robert K. Merton）的结构功能主义影响而提出的一个中层社会学理论。与新同化论不同，分层同化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定义较为狭义，特指是受种族分层和阶级分层制度影响的社会体系，不包括美国社会的边缘化区域和人口。分层同化理论抛弃了经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不同的移民群体不一定要按照同样的方式，即以白人中产阶级的理念主导的方式，向主流社会融入。但分层同化论也推断移民的同化过程的复杂性和将会导致的不同结果，但区别在于，分层同化理论聚焦于解释为什么来源国的不同会引起移民群体和个人社会适应结果的显著差异，为什么来自某些国家的移民族群会相对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而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族群则更容易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更具体地说，这一理论把移民文化适应和社会整合的两个关键层面的同化过程，置于充满着族裔不平等和种族和阶级居住分离的主流社会的大背景之中来考虑，从而推论同化过程会循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可能导致各种不同的、而不是单一的结果²。

从分层同化论的视角来看，当代移民及其后代有三条主要的社会适应路径。第一条是**传统的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即移民通过不断的文化适应和经济整合，随着时间推移自然而然地进入美国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中。这是一种较为熟悉的传统模式，如同经典同化论所预测的一样，移民群体会逐渐地割裂原有的族裔纽带，抛弃原有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与行为模式，最终融入以非拉丁裔白人为主导的核心文化和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导的主流社会，完成向上同化（upward assimilation）。第二条路径是**向下同化**（downward assimilation），即移民在文化适应和经济整合的

¹ Alba and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p. 12.

² Portes and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过程中，因结构性的障碍而直接融入美国主流的边缘地带，如贫民窟。沿着这条路径行进的过程中，移民群体的一部分成员融入了本土边缘社会亚文化，也有的成员结合本土亚文化和外来文化而重建一种混合型的移民边缘社区亚文化，这两种亚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核心文化格格不入，通常对陷入社会流动阶梯底层的族群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三条路径是**经由族裔社区，通过有选择性的文化同化而最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向上同化途径有保留地吸收主流文化，同时刻意保留本族群的族裔特性（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准则），重建族裔社会网络和社区组织，创造族裔资源，以利移民能够利用这种族裔的优势而成为中产阶级。

问题的关键在于，移民群体将会融入到接收国社会的哪一个社会阶层，是什么原因使之融入到那个社会层。根据实证研究，分层同化可以通过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来测量，如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和是否拥有房产等等。对于移民的子女来说，向下同化的指标包括辍学，早孕，被捕或判刑等，这些变量可以有效地推断出他们将来的低学历、低职位、低收入和低购房率的前景。引起这些结果的可能性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个人的因素和结构性的因素。主要的个人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英语水平、出生地、抵达美国时的年龄以及在美国居住时间的长短。结构性的因素包括种族地位、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居住区域。经典同化论的模型也考虑这两组自变量。经典同化论的观点认为，学历高、英文好、在美国出生或很小就来到美国、在美国居住时间长、肤色较浅、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良好，以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之外的中产阶级社区居住等等，这些有利条件应该有助于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而分层同化论则认为，这两组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两组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结果。强调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是分层同化论与经典同化论的一大区别。

另一大区别是分层同化论强调移民群体迁出背景（context of exit）与迁入背景（context of reception）之间的互动关系¹。这两组因素是群体层面的因素，也与上述讨论的两组因素进行互动。移民群体迁出背景包括如下的可测量的因素：移民在祖籍国已经享有的社会地位，移民前已经拥有的资源（如资金、知识和职业技能等），以及移民的途径、动机、愿望和行为。迁入背景包括如下几个与接收国有关的环境因素：移民群体的族裔特征在接收国种族分层制度中的地位，接收国政府的移民安置政策，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条件，公众对该移民群体的态度和接收程度以及在接收国已经存在的族裔社区的实力和影响。其中最后一个因素最为重要，移民抵达接收国时，有无同族的族裔社区存在以及族裔社区的强弱，对移民的社会流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分层同化论认为，不同的社会流动结果是由不同群体独特的迁出背景和迁入接收国的背景的互动所决定的。由于移民群体的迁出背景和迁入背景因素不尽相同，移民群体的文化模式、同化策略、生存环境、社会关系和以及可控制的资源都是带很强的族裔特性的，而族裔特性既可为移民个体的发展提供发展的机会也可带来结构性的限制。这些移民群体层面因素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移民个体层面因素。

移民群体迁出背景与迁入背景之间的互动导致移民或难民群体不同的同化路径，进而可以解释移民群体在新家园的社会流动的成功与否，为什么族群之间有显著差异。例如，为什么在同一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居住同一街区，就读同一学校的情况下，亚裔（来自中国或韩国）移民的子女比拉丁裔（来自墨西哥或中美洲国家）移民的子女的学习成绩更为出色？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各种各样，答案要从这些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其中有一个环境因素在华裔和韩裔群体中是共通的，那就是族裔社区的课外辅助教育系统，其中包括非营利的族裔语言学校和营利性的课外补习和提高班，考大学准备班和咨询服务以及重在发掘孩子智能和提高大学入学竞争力的一

¹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系列课外文体活动¹。这一套完整的族裔课外辅助教育系统，不仅是因为华裔和韩裔移民的迁移背景，即移民群体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而且也因为这两个族群在祖籍国所遭遇的相同经历，即竞争激烈的一考定终身的教育制度。相比之下，在拉丁裔群体中缺乏这类族裔教育资源，墨西哥裔或中美洲裔的移民社区虽然与华裔和韩裔移民同住一个街区，但他们没有自己的聚居区族裔经济，也没有自己的族裔课外辅助教育系统，他们的孩子只能靠公立学校和社区非营利组织的非常有限的教育资源，因而他们的课外环境和活动与亚裔小孩的差别甚大。此外，与华裔或韩裔移民居住在同一街区的墨西哥裔或中美洲裔移民的孩子，基本上被排除在华裔或韩裔的课外辅助教育系统之外，无法利用其他族裔的社区资源。有关族裔课外辅助教育系统，我将在下一节剖析具体案例来更详尽的阐述。

现有的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已经充分论证了分层同化论的可信度和合理性。来自不同迁移背景的移民群体不可能以同一路径融入接收国主流社会。当代移民的第二代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或向上、向下、或横向地同化于接收国的种族和阶级分层制度中。应当强调，向下同化只是分层同化论所预测的几个可能的结果之一。奇怪的是，分层同化论往往被误解或有意歪曲为只关注和预测向下同化的可能性，因而被指责为对新移民第二代持过于悲观的态度。我认为，如果要驳倒分层同化论，认定新移民第二代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来自哪个种族身份，迟早都会融入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的，那么就必须要用实证资料推翻以下两个假设：（1）各个移民群体的向下同化的指标（如高中辍学率，少女未婚怀孕率，违法被捕率等）没有显著的差异。（2）不同族群的同化结果的差异是随机分布的，与移民的族裔特性和独特的同化模式无关。

我在对美国 1965 年后的移民第二代进行实证研究时，基于分层同化论去探究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聚焦于族裔聚居区来探究族裔社区这一中观层面的结构因素对移民社会流动结果所起的作用。二是强调族裔特性和文化如何与其它宏观层面的结构因素的互动关系来解释族群差异。以下我将以两个个案——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和越南裔第二代——阐述分层同化论的应用问题。

三、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在美国成长：机遇与困境

（一）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在成功的背后

亚裔移民美国的历史要长于大部分东欧裔和南欧裔的移民。最早大批移民美国的亚裔是华裔，始于 1840 年代，其次是日裔，始于 1900 年代初，再次是菲律宾裔，始于 1920 年代，在 19 世纪初也有韩裔和印度裔移民，但人数较少。由于美国政府实施 1882 年的《排华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排亚法案，亚裔移民人数占总移民人数不到 3%，亚裔社会的发展非常地缓慢。直至 1965 年美国移民法改革之后，亚裔社会才开始改观。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人口以递增速度增长。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140 万增长到 2000 年的 1190 万，2010 年增长到 1732 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5.8%。1970 年以前，亚裔移民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华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是两个最大的亚裔族群（2012 年这两个族群的人口分别为 400 万和 342 万），其次是印度裔（318 万），越南裔（174 万）韩国裔（171 万）和日本裔（130 万）。另一个特点是来源国多元化。除了六大族群，还有来自 20 多个其它亚洲国家或族裔的群体，如柬埔寨，老挝，老挝苗族，泰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移民，人口接近两百万。

国际移民是亚裔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将近 60% 的亚裔美国人在外国出生。当代亚裔移民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通过不同的移民途径。有亲属移民，也有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和劳工移民，还有为了躲避战争，躲避政治或宗教的迫害或摆脱经济困境等的难民。华裔、菲律宾裔

¹ Min Zhou and Susan S. Kim, "Community Forces,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The Case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6 (2006): 1-29.

和印度裔美国人中有相当大部分是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大多数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裔的移民都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低教育、低技能的贫困劳工。然而，如果用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来测量，亚裔群体总体的平均水平比美国人口平均水平要更为出色。以教育水平为例，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亚裔25岁以上成年人的拥有大学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百分比是美国所有族裔群体之最，占49%（全美：28%；其中非拉丁裔白人：31%；非裔：18%；墨西哥裔：9%）。不过，亚裔群体内部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例如，在印度裔成年人中，69%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37.5%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在华裔成年人中，51%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25%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相比之下，在越南裔成年人中，18%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7%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在老挝苗族成年人中，11%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4%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2009年印度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的中位值是98970美元，华裔的是80643美元。而越南裔的家庭收入的中位值是56279美元，老挝苗族的是45611美元（全美家庭收入的中位值：61082美元；其中非拉丁裔白人：68205美元；非裔：39757美元；墨西哥裔：39754美元）¹。

由于历史上对亚裔的法律排斥，由于亚裔社会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移民潮所驱动的原因，美国的亚裔社会是以1965年以后抵达美国的移民为主体的社会，新移民第二代从80年代末才开始成长起来（日裔美国人除外，日裔现在已经出现第四代了）。2010年，大约59%的亚裔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称为第一代（也包括移民小孩，即1.5代）。30%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国出生，称为第二代。第三代（本人和父母均在美国本土出生）以上的亚裔美国人仅占10%左右。在21世纪初，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大部分都还很年轻，他们的父母在外国出生，大多是在最近30年才移民美国的。但是，似乎很少人会担心这些亚裔移民的孩子能否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父辈移民美国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二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教育成就十分显著。事实上，大多数亚裔移民的孩子，包括那些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出身的孩子，都能在学校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在职场上和生活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美国媒体把亚裔誉为“模范少数民族”，民间大众和许多公众人物甚至学界的一些学者把亚裔的成功归结为族裔文化价值观（如重视家庭，教育，刻苦耐劳精神和未雨绸缪等）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模范少数民族”反映了现实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幻象。我的观点是，亚裔移民以及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生活在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这种分层不仅仅基于阶级地位，还基于种族地位。新移民第二代的成功，不仅仅由于他们有了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微观层面的文化因素必须跟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结构因素互动才对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分层同化论可以解释这些不同层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亚裔新移民第二代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迁出背景，其中包括移民素质的筛选性（immigrant selectivity）以及族裔社区的作用。亚裔移民不是一个单一的族裔群体，而是一个由多个族裔群体组成的多元文化群体。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移民历史，迁出背景，家庭背景和族裔社区资源，这些因素影响和决定了亚裔移民孩子的教育成就。跟其他族裔的移民孩子一样，亚裔移民的孩子也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向上、向下或横向同化，融入阶级分层和种族分层制度森严的美国社会，也会产生社会流动结果的亚裔内部的族裔差异。

首先，美国亚裔社会由于存在不同的阶级，导致了社区内部的经济状况，使亚裔美国人的社会流动前景和方向变得复杂难测。中产阶级的移民一来到美国，就能找到一份高薪的职业，有能力在郊区买房安家，过上较舒适安逸的物质生活。而劳工阶层的移民或国际难民却不得不从事低薪的工作，生活贫困，只得在城市中心贫民区租房。他们的子女不得不面对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和城市中心贫民区恶劣的居住环境及其所带来的结构性的问题，如贫困集中，住房拥挤，

¹ 美国联邦统计局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index.xhtml>。



帮派泛滥，治安恶化，青少年对抗文化和校区较差等等。

另外也有一些悖于常理的趋势。一些在祖籍国已经是中产阶级的移民在迁移后面临下向社会流动，他们移民美国之后，社会地位反而由于自己没有对口的工作技能或学历，英语能力较差的缘故而降低，因此不得不与劳工阶层的移民或美国社会贫穷潦倒的少数民族一起打工为生，挤在贫民区生活。但又有些在祖籍国属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移民可能会通过家人、朋友或族裔就业网络的帮助，落户到以移民为主的中产阶级族裔聚居郊区工作和生活，有些则在同族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当住家管家。此外，由于人口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一些移民群体的聚居区族裔经济繁荣发达，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同族成员创造了机会和有形或无形的利益，使他们有条件实现上向社会流动。另外一些移民社区则因为缺乏同族的族裔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无法创造这样的机会。因此，阶级分层的结果未必就会自然而然地在移民第二代中得到复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能保持好的学习成绩，而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也能摆脱学习成绩不好的困境。

第二，种族因素通常与阶级因素产生互动，对第二代亚裔美国人的影响远大于他们的父母之辈。一方面，尽管亚裔移民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他们的文化和移民历史如何不同，他们在美国社会都会被视为一个族群。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社会较为开放，亚裔移民的教育水平、职业位置和收入水平高于平均值，种族主义仍然存在，种族刻板印象仍然影响亚裔群体。虽然亚裔美国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仍被视作“外国人”，遭受诋毁谩骂和人身攻击。此外，亚裔美国人所受到教育回报也不平等。他们往往需要异常高的考分才能进入名校，需要付出多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与白人相当的职位和收入。他们意识到，跟其他人做得同样好往往是不够的：“你一定要非常出色，你必须加倍努力，做得更好。”还有，亚裔的专业人士常常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例如，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工作勤奋、能力超强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但却不是称职的经理或主管。

美国亚裔具有双重的刻板形象，既是“模范少数民族”又是“永久的外国人”，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刻板形象，第一代移民颇不以为然，但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却非常地在意，也是他们要争取自身权益的一个出发点。移民第二代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新家园所提供的机会心怀感激之情，还能忍气吞声，暗自吞下不公平待遇的苦果，强忍种族歧视的痛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应该与其他的美国人平起平坐，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他们对不公的现实比较敏感，会有意识地抵制不平等的种族分层制度的压迫。一方面，他们会与主流社会的制度对着干：可能会有意识地组织和参与反现实制度的青年文化活动，可能对现有的主流文化和学校的教育制度采取对抗的态度，也可能会把种族自卑感内化成一种集体性的自我认知，即族裔力量（minority power），并以强化这种与主流社会大相庭径的族裔特性。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跟自己的移民家庭对着干：可能会觉得他们父辈的移民文化过于老套，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不合时宜，也可能会脱离他们的家庭和族裔社区的支持和控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貌似争取权益的表达方式和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境况下反而会阻碍而不是促进他们的上向社会流动。

第三，移民家庭对他们子女的生活和成长影响极大。尽管亚裔包含有多个不同的族裔群体，但不同族裔移民的子女都有一些相似的家庭经历。第一代移民通常都对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他们的子女则用优秀的学习成绩和找到好的工作来作为报偿，使父母脸上有光。很多父母移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子女能有更好的机会，尽管代价是他们可能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向下流动。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子女的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但他们认定教育是最可靠的融入主流社会的途径。因此，他们不仅仅给自己的孩子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在学校中成绩优异，他们还提供各种物质手段以确保他们的学业成功。他们通常会搬到良好的公立学校系统的社区，把子女送到课后补习班，包括母语学习班，课业辅导班，以及各类课外活动班等等，花时间查找

详细的学校资料，以及为子女选择学校和专业。

虽然父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子女，但子女们却有不同的看法。许多移民子女对父母的祖国缺乏关联和感情，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太平洋另一端的一个陌生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参考坐标，他们以自己出生或成长的国度作为自我评价的出发点，他们在意这个国家和环境对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脑筋死板，思维老套，不入流，且过于严格。于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代际关系之间的冲突。不过，他们也经历过一些父母作为新移民在美国的奋斗过程，他们因而对父母也有一种独特的敬畏的感情。此外，他们生活在经历过民权运动而变得更加开放的美国，也可为融入主流的美国社会，而这正是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而言之，机遇和困境并存。第二代亚裔美国人的成长，要经历移民和种族化的心路历程，跨越两个不同的社会过程。一方面，虽然不同的族裔特性和传统文化的界限随着代际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由于迅速的文化同化和种族通婚），第二代移民依然常常会受到移民传统的影响和限制。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种族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种族划分使阶级的影响力和代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少数族裔成员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来克服主流社会所强加的不利条件，因此，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族裔性作为团结一致的基础，共同克服困难，抓住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在分层同化理论的框架中，族裔社区对创造有形和无形资源起到关键的作用，深刻地影响到移民子女的同化过程。对于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尤为重要。如果说贫穷社区对本地出生的少数族裔儿童会有负面的社会后果，那么，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区如何才能引导青少年避开与贫困有关的负面影响，迁出市内的穷区？看来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利用超出家庭界限的族裔社区的社会资本，这一点正是我等所提出的分层同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二）多层次社会整合模式：越南难民子女在美国成长的社会学研究

在 1990 年代初，我与当时在路易斯安纳州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班克斯顿（Carl L. Bankston）合作，共同开展了一项有关越南难民子女在美国成长的社会学研究，合著了题为《在美国成长--越裔青少年如何适应美国社会》一书，也与他合作发表过一系列有关论文¹。虽然这项研究是探究居住在新奥尔良市东部的一个贫穷都市社区的越南难民子女同化过程的一个个案研究，但对于解释族裔社区与移民同化的关系和建立分层同化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引起我对新奥尔良市东部的越裔难民社区兴趣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我们的观点是，新奥尔良市东部是一个由于 1970 年代白人大逃离（white flight）而迅速衰落的、贫困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非裔黑人高度集中的都市社区，越裔难民从 1975 年越战结束后被集体安置在那里，社区继而非裔黑人社区演变成非裔和越裔两大族裔并存的社区。住在那里的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越裔家庭比非裔家庭的平均收入更低。在那个社区的公立高中里，只有非裔黑人和越裔学生，基本没有白人学生。最为突出的是两极分化，越裔青少年既被称为“全优学生”，又被称为拉帮结派的“坏孩子”。这种流行的二元看法似乎前后矛盾，其实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在那所高中里，学习成绩全优的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越裔，而社区里的青少年的帮派活动中，越裔的也甚为猖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越裔难民第二代的同化产生如此矛盾的结果呢？这就是最

¹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Case of Vietnamese Youth in New Orleans Eas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8 (1994): 775-799; Carl L. Bankston III and Min Zhou,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Vietnam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Evidence for a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 (1997): 508-523;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Growing Up American: How Vietnamese Children Adapt to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Family Pressure and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Daughters of Vietnamese Refuge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9 (2001): 133-151.

初我有兴趣探讨的问题。

越南裔移民是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以国际难民的身份几经辗转才被安置在美国的。是当代美国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美国军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东南亚的军事介入和行动，导致了越南人和其他五十多万的印支难民移民美国。越裔难民归化美籍后又迅速建成家庭移民链（family-chain migration），资助亲属移民，因此族裔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4 千多人，急增至到 1990 年的 62 万人，而在 2010 年，越裔人口达到了 174 万人，越南难民的孩子因而成为最新的新移民第二代。1990 年，18 岁以下的越裔未成年人口有 52% 在美国出生，27% 在五岁之前移民美国，17% 在 5 岁至 12 岁之间抵达美国，只有 4% 在 13 岁至 18 岁之间抵达美国。这个越裔群体中，有只有 39% 的人英语流利，25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 17% 的人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990 年的美国有 20% 的成年人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989 年越裔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接近全美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的 3 万美元。但是越裔的贫困率为 24%，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有 25% 的越裔家庭靠政府福利救济为生（全美平均为 7%）。

1990 年代初居住在新奥尔良市东部的越南难民，主要是来自越南农村、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他们那时大多数都是刚移民到美国不久。通过一个天主教的慈善机构的帮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集体地被安置在城中一个最贫穷的社区。当时那个社区的居民中非裔黑人占 46%，越南人占 43%，白人和其他族裔占 11%。1990 年，这个社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值为 17000 美元，贫困率是 37%。显然，越南难民在美国的新生活是从社会的最低层开始的，如果这些越南难民的子女要在美国实现上向社会流动，无法依靠家庭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而达到此目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基本没有这些物质资源。然而，他们有可能通过家庭和自己族裔社区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来克服这些困难。大部分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大家抱团，相互依赖，相互帮助。一方面通过越裔天主教会寻求社会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教会的帮助指导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社区，族裔群体的成员与教会之间彼此之间形成了紧密相连的社会关系，用集体的力量去适应美国社会并努力取得成功。大多数越裔孩子在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中就读，但也能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他们的教育成就并非来自于单独的家庭的帮助，而是得益于族裔社区的社会资本。不过，也有一部分越裔青少年高中辍学，加入街头帮派热衷出轨行为,介入犯罪活动。

我们运用分层同化论发展出一个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用以解释个体、家庭和社区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教育取向和社会适应结果以及今后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我们认为，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成绩，并非仅仅与文化价值，个人努力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有关，也与各种不同层面的结构因素和分层社会融合有关。图 3.1 展示了我们提出的在理想状态中的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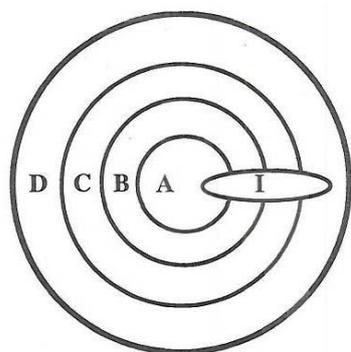


图 3.1：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理想状态¹

I: 个体；A: 家庭；B: 族裔社区；C: 居住街区；D: 接收国主流社会

¹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Growing up American*, p. 204.



如图 3.1 所示，椭圆形代表移民个体。在理想的状态中，核心圈以及各层外围圈成正圆型。核心圈 A 代表移民家庭，最小的社会单位；包着核心圈的是族裔社区，中层亚社会；包着族裔社区的圈是居住街区，中层社会；包着居住街区的最外围的大圈是接收国的大社会，主流社会。虽然每一社会层都有各自一套价值体系，如公众认可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社会流动目标，但各社会层的价值体系与主流社会的基本一致。为移民的同化提供方向和社会支持与社会控制。以利于他们最终融入主流社会。在这种理想状态下，移民个体与家庭整合，移民家庭与族裔社区整合，族裔社区与地域方位上的居住街区整合，通过多层的有机整合，移民个体最终融入主流社会。也就是说，若要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一方面取决于个人与家庭相互适应，另一方面取决于居住街区与主流社会的相互适应。

如果居住街区与主流社会没有冲突，即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市区街区或郊区，族裔社区的作用会显得可有可无。可是在现实中，许多移民城市的居住街区，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本土少数民族或移民聚居的街区，是一个偏离主流社会的社会层，是接收国大社会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被主流社会遗弃的、体现了种族和阶级交错的（少数民族和低收入贫困阶层集中的）边缘化社会。对于置于这种边缘化社会环境下的移民群体来说，由于贫困的家庭缺乏对个体的引导和物质支持，可能会导致在同化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所在街区与主流社会的差异过大。居住那里的移民小孩，可能自然地当地青少年亚文化的吸引，反叛家庭而融入到边缘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光靠家庭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族裔社区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区可以联手，引导青少年避开边缘化的社会层，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如图 3.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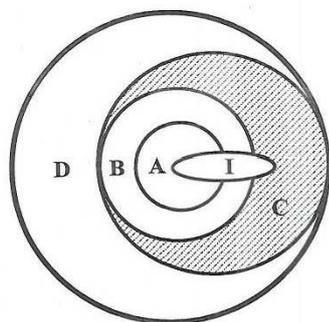


图 3.2: 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现实状态¹

I: 个体; A: 家庭; B: 族裔社区; C: 边缘化了的居住街区; D: 接收国主流社会

我们在对新奥尔良东部对越裔青少年的社区研究发现，越南裔的家庭和社区具有与美国主流社会相同的一套价值体系。有明确的上向社会流动目标、期望值和行为规范准则，即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刻苦勤奋而取得中产阶级的地位。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越裔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案例的共同特点就是个人与家庭脱节或家庭与族裔社区脱节。有越轨的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越裔青少年大多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是与族裔社区联系极少的家庭。这些青少年居住街区的边缘社会的不良文化所吸引，模仿当地不良青少年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并建立自己的帮派与本土帮派打斗争地盘，危害社会治安，本人无心向学，通过邪门歪道谋利。与此相反，学习成绩好的青少年大多来自双亲家庭，与族裔社区和族裔天主教堂有紧密联系。我们观察到，这些青少年经常被灌输要尊老爱幼，勤劳肯干，听父母话等等。在越裔社区里这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家庭都是如此。在这种族裔社区环境中，不少家庭生活生活在自成一体的圈子里，受外界的不良影响较小，这些经常上教堂的家

¹ 同上。

庭和青少年，不容易受到其它不良因素和当地青少年亚文化的诱惑。此外，这些青少年感到周围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都经常关注他们，很难能做出轨的事而不被发现。

这项研究的成果证明，多层次社会整合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越南难民的孩子能够在不利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而有些则走上歧路。要成功地对下一代灌输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需要移民家庭与坚持传统道德规范的族裔社区的紧密结合。因此，同化的不同结果，取决于移民子女如何与家庭和族裔社区相互整合。同理，同化的不同结果也取决于移民子女所在的族裔社区或居住街区的社会环境及其如何与主流社会的整合。相比住在同一街区的本土非裔黑人，越裔青少年之所以学业成绩更为优秀，教育成就更为显著，在很多程度上取决与越裔社区所提供的社会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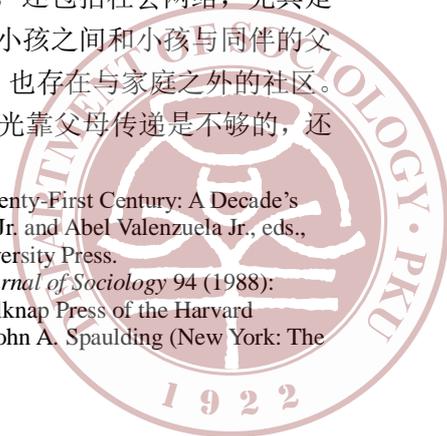
2003年，我们重返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裔社区，再次对越裔青少年的态度和行为变化趋势进行了调查，并把最新搜集的数据与在1990年代初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对比又有了新的发现¹。10年后的新一代越裔青少年大部分在美国本土出生，与90年代的青少年生长在不同的族裔背景下。我们发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依然存在，但“全优生”的人数比10年前明显减少，而越轨违法的“坏孩子”的人数却在增加。此外，我们发现较为富裕的越裔家庭纷纷迁离，困在原来社区的贫困家庭对族裔教会和族裔社区的依赖性减少，因为他们随着抵美时间的推移，更加依赖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的救济。跟10年前相比，尽管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更长，对美国社会更为熟悉，越裔家庭反而不能引导孩子充分利用族裔网络和族裔社区的社会资源。随着本族裔中产阶级的外迁，位于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裔社区更为边缘化了，住在那里的低收入越裔家庭与越裔社区的整合程度比十年前要低。这些发现表明，对于生活在低收入街区的越裔青少年来说，青少年对抗亚文化和违法犯罪行为变得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早些年媒体报道的“越裔全优生”的事迹还不时出现，但已经越来越少了。越裔青少年的家长也开始面对其他低收入社区所出现的类似的问题，如逃学、辍学，吸毒、早孕和参加帮派组织等。正如一位在越裔聚居区居住的居民在接受访问时说，“在这个国家住久了，很难保持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我们的孩子认为越南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传给他们。”即使仍然存在完整的家庭结构和越裔社区，要想维持过去那种高度整合的族裔联系，也确实是越来越难了。

我们从对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裔社区前后的两项研究中发现，同化或融入美国社会既非全是正面的经验，也非全是负面的经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新移民或难民群体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可能会伴随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在美国社会成长的第二代与他们父母的成长环境全然不同。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很快在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安家的人来说，社会流动和同化的过程会相对顺利，因为这个过程大体上是水平方向的流动。

在这里，我们借用两个相关的古典社会学概念来解释上述的社会现象：一个是科尔曼（Coleman）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另一个是涂尔干（Durkheim）的规范整合的概念²。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能够为同一社区的成员带来有利结果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培养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价值系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和规范），还包括社会网络，尤其是对儿童成长有利的小孩与小孩之间、父母与父母之间以及父母与自己小孩之间和小孩与同伴的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根据科尔曼的观点，社会资本既存在于家庭内部，也存在与家庭之外的社区。价值系统有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但要在下一代实现，光靠父母传递是不够的，还

¹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2006. "Delinquency and Accultu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Decade's Change in a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Pp. 117-139 in Ramiro Martinez Jr. and Abel Valenzuela Jr., eds., *Immigration and Crime: Ethnicity, Race, and Violen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²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95-120;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By John A. Spauld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897/1951).



需通过社会网络来传递。换句话说,传统的价值系统和紧密的社会关系在任何社会环境中对于小孩都会有产生影响,但其对于上向社会流动的影响可能会因社会资本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亚裔移民家庭所共有的一些的文化特征,如和睦家庭和尊重长辈等,对孩子将来无论在美国社会的哪个阶层生活和工作都会有利,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利于学业进步的边缘社会环境中的家庭,坚持这种族裔文化和传统显得更为重要,而支持家庭去强化族裔文化和传统要靠雄厚的社会资本。

对于移民第二代,族裔社区提供了一个社会资本形成的环境。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相互提供帮助,也有利于推动家庭与社区的整合关系,致使移民父母之间和孩子之间经常在族裔社区中进行交流互动。在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族裔社区内,父母和孩子会各自通过这些交流互动来分享相关的经验。于是族裔社区就可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既缓和本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也缓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家庭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族裔社区也可以通过不断地交流和沟通,适当地改变传统的族裔文化模式,使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易于接受,成为新的行为准则。

然而,每个族裔群体的成员参与族裔社区活动和介入族裔社会网络的频度和深度都各不相同。如果说一个族裔群体内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会影响群体成员的同化过程,那么从逻辑来说,这种影响取决于族裔成员对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社会关系的维系程度。因此,族裔社会关系的维系与族裔身份认同是相互关联的。个体越是认同自己的族裔社区,就越有可能会遵守族裔群体的行为规范而不渝矩。当然,族裔社区也有可能对族裔年轻人的同化起到阻碍作用,尤其在族裔社区物质资源薄弱或族裔社区对抗主流社会的情况下。此外,族裔社区环境也可能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资本的概念也可以看作是涂尔干久负盛名的规范整合理论的翻版。涂尔干认为,个体行为应该看作是个体的社会整合程度的结果。个体在群体中的整合程度越高,群体对个体的控制机制就越强。在解释移民的同化过程时,孩子越是融入自己的族裔群体中,就越是容易遵守群体的行为规范,抵制群体所不齿的行为准则。在考察族裔特性是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或是不利于形成社会资本,十分有必要去研究融入这个族裔社区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同化过程。

四、结论

对于不同族群的移民第二代来说,在美国成长的经历各有异同,有些经历了天衣无缝般的顺利过程,有些则经历了充满坎坷的磨难。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通常都积极地接受和认同美国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希望与美国主流社会融为一体,自我认为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渴望被主导社会的白人族群和美国公众所接纳。然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摒弃自己原来的族裔身份,但是,他们总是在“模范少数民族”与“永久的外国人”之间徘徊。在某些场合下,他们仍然会被视为“没有被同化的外国人”。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们又可能会因为显示出自己的族裔身份而被认为是完全适应了新环境而融入了主流社会。在这些亚裔年轻人努力地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漫长过程中,他们的上向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迁出背景和迁入背景两组结构因素的互动,如他们的家庭移民前在祖籍国的社会地位,父母在移民前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本族群体在接收国的种族地位,他们自己在新家园的地方社区成长的社会环境,本族裔社区的强弱以及他们在适应过程中所重建的文化模式,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等。另外,接收国社会对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所提供的机会也并非绝对平等,即便移民群体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机会,由于族裔群体在和迁出背景和迁入背景的不同,不仅会致使他们不能平等地把握机会,还会在同化的过程中遭遇到不同的结构限制,进而造成族裔差异。

多向分层同化论认为,接收国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种族分层和阶级分层制度森严,移民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经历同化过程,既有在富裕的、以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郊区,也有在以

多元少数民族共同聚居的中产阶级郊区，还有城市中心区的族裔聚居区和贫民窟。这些不同的迁入环境并非总是有利于移民后裔的成长，有些环境即使适合第一代移民，也未必适合他们的子女。而融入美国社会所经历的不同社会环境和自愿或被迫选择的不同路径，对同化的多元结果——上向、下向或平向社会流动——都有可能影响甚大。对那些原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来说，下向流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流动，不如说是原地踏步，因为他们已经在最底层了，这种下向流动结果是新移民第二代的向下同化。据此，分层同化论可以让我们提出或继续思考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些族裔的移民群体会陷入向下同化的路径，甚至长久地、世代代地被困在社会底层，而另外一些族裔的移民群体则能够避开这种悲剧性歧途？

【论 文】

跨国主义的实践与移民祖籍国的发展： 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¹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² 周敏³

摘要：无论在经济学或社会学学界，以往有关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的研究大多注重跨国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等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强调行政制度和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有关国际移民的研究不仅将人口跨国移动这一现象归咎于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也同时视之为影响国家不发达的结果。近年来对于移民国际汇款的研究开始注重微观的理论视角，强调移民个体和家庭的能动性。然而，这种在研究视角上的转变对于研究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发展的关系显然是不足的，因为它并没有考虑到移民群体自身所产生的组织和结构方面的效应，也没有考虑到在移民社团组织与祖籍国政府之间日益增长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促进发展的合力。本文的目的旨在深入探讨这一论题。我们通过最近刚完成的对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两大移民社团的比较研究，描述移民与祖籍国——墨西哥和中国——的地区及国家层面的密切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对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发展的因果进程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提出研究移民跨国主义的中层理论架构。与此同时，本文还讨论了此项研究在实践和决策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国家发展，跨国主义，移民社团组织，国际汇款，墨西哥，中国

一、导言

以往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大都着眼于输出地或祖籍国的“推力”（push）以及居住地或接收国的“拉力”（pull）的宏观因素，将人口跨国移动这一现象归咎于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也同时视之为影响国家不发达和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社会不稳定的负面的结果。一般而言，国际移民研究大多将移民个体作为分析基本单位。例如，古典经济学把个体视为是决定迁移行动和过程的主要决策者，而社会学以及新移民经济学则优先考虑家庭因素，把由个体组成的家庭作为

1 本文曾刊于《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1年第13期，1至29页。

2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男，社会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3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